

## 龔重安殺人事件的省思

謝文彥（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 龔重安殺人事件的發生

今（2015）年5月29日下午16時20分在臺北市文化國小的隨機殺人事件，引發社會大眾高度關注。28歲失業中的嫌犯龔重安翻越文化國小校園後門圍牆，至四樓女廁所，以水果刀對8歲女童割頸2刀，造成女童不治。這一件由一位人際疏離、工作不穩定、沒有目標與價值感，又遭遇現實高壓力的男人，侵入其17年前的母校，針對一個落單且毫無防衛力的陌生女童，以割喉方式進行殺害的事件，必然造成民眾難以理解與高度不安。難以理解的是，何以龔嫌會對一個毫無關係亦無恩怨的幼童下手？不安的是，何以任何人在公共場所都可能無緣無故的被殺害？社會上到底還有多少類似鄭捷或是龔重安等隨機殺害別人的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於案發當晚召開緊急會議，表示將重建校園安全、並檢討警察進校園的相關議題。許多家長為了小孩安全，親自接送小孩上下學；各學校及警察機關也立即強化校園安全的防護措施。事件一週內（6月5日），正巧法務部執行了王俊欽等6名死刑犯的槍決，而大多數民眾也在此案件所帶來的恐懼與憤怒之情緒下，強烈表達出反對廢死之主張。

### 事件的原因分析

民眾納悶的是，何以龔嫌會對一個毫無關係亦無恩怨的幼童下手？至今我們只能從有限的報導資料來觀察，並立即採取可以防範的必要措施，讓此類案件成為一個可以理解、又可控制的事件。

從遠因來看，龔嫌早期與家庭缺乏良好的關係與互動，或許就是造成殘暴無情心態的起點，長期得不到肯定而產生自卑心理，讓他與家人的關係疏離，內向不善言辭的他又難以和同學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使得他經常退縮到孤立、防衛、上網咖、及幻想的世界中。他的哥哥曾說：「弟弟以前很正常，只是不太和別人互動，五年前突然離家，今年過年短暫出現，卻又無聲無息斷絕聯絡。」這麼一個孤獨生活型態，使得他內在的心理壓力找不到宣洩的出口，外界的關心與支持也進不了他的世界，只得長期獨自承擔面對，當他難以面對現實生活時，或許就常轉進幻想之中，並以幻想取代人際交往，而這又讓他不斷的進入退縮與自卑的惡性循環之中。

從近因來看，我相信這一位感受不到家庭溫暖、得不到社會支持，覺得工作沒有前途、生活沒有保障、且又找不到人生目標的龔嫌，一定也花了不少力氣很想從現實生活中找到意義與價值，以免被空虛與無價值感所吞沒，但是無能力及工作不順利卻讓他難以在現實生活中以適當的方法獲得，於是興起了敵對社會方式的幻想，例如其公司同事所描述龔嫌曾講過的話：「鄭捷的任務已經結束，現在輪到我了」，或是「如果沒有被羈押或交保，會想辦法再來法院，還會犯案或到艋舺公園當遊民」，企圖為自己找到可以繼續活下去的明天。

龔嫌自述他擁有幻聽，他自述2年多前開始有聲音對他說話，最早是「你真沒用，大家都在笑你！」後來這種聲音越來越多，像：「某某瞧不起你」、「某某對你很不爽」，自覺快被逼瘋。這些都是幻聽嗎？我不認為，我覺得他應該只是充滿幻想而已。因為當一個人經常退縮到非現實的幻想來取代真實的人際交往時，此種幻想會被培養，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甚至難以區分出幻想或真實、虛擬或現實。

最後，我所思考的是：到底什麼因素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除了內在充滿幻想外，龔嫌應該還有一些難以處理的立即性壓力，包括其自己所供稱因為找不到工作想洩憤才會殺人的失業或工作不順利的問題，以及去年八月至今被銀行催繳12萬元卡債的壓力。

缺乏任何社會支持、又生活無任何希望，再加上面對需馬上處理但又無法排除的立即性壓力，使得他的幻想越來越嚴重。對他而言，或許幻想可讓他轉變為實際的殺害行為，也可讓情緒得以紓解或解放、可合理化其行為的管道了，也就是說，幻想後，代之而取的就是正式的殺害行為。

## 預防此類案件之道

未來我們該如何預防此類案件再次的產生呢？我覺得應回歸到理性客觀的分析上，能對個案掌握及建立更豐富且正確的資料，才能作出更精確的分析與診斷，也才能以理性的與有效的方法來面對，當研究調查的資料顯示出殺害陌生小孩的案件不到整體小孩被殺事件的10%，且很多是類的兇手對自己早就沒有生存希望時，你就會發現，其實預防此類案件的措施與校園圍牆的高低無關，亦與死刑是否存廢無關。預防可從下面幾方面著手：

首先，學校可做的是加強管理、監控與警覺反應訓練：學校強化學校門口與校園環境管理，可讓潛在歹徒在侵入時增加風險的考量，而高度的警覺性也能讓學校去注意任何一個行為怪異者出現而前往處理。

其次，為了減低模仿效應的產生，警方可強化網路上發表類似攻擊言論的辨識與監控，例如日本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後，警察立即開發一種可以迅速發現網上犯罪預告的技術，並在發現類似模仿言論後立即逮捕處理。

第三，強化國民心理健康才是問題基本解決之道：心理健康在良好的家庭關係與人際互動中所建構出來的；相反的，心理不健康則常是不良親子關係或脆弱家庭連結的結果。為了減低心理不健康者的產生，政府機構或社會團體可強化親職教育，並衡情提供高風險家庭必要的協助。學校也可強化辨識與協助受虐、情緒管控困難、人際溝通困難的學生，提供適當的訓練與協助。

最後，強化社會政策作為：提供青少年穩定的就業訓練與機會，讓他們在工作上發揮所長、找到希望。此外，醫療衛生機構對於精神障礙者、憂鬱症患者、高自殺風險者應多提供醫療協助與社會支持，以減低自殺或殺人的可能性。